

中国式官场的悲剧英雄

——评唐浩明长篇小说《张之洞》

颜小芳¹, 吴投文²

(1.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2.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唐浩明的长篇小说《张之洞》,塑造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人格为核心的中国式英雄形象。小说在逆境选择和矛盾冲突中突显英雄人物主体价值,在社会关系和人物对比中突出英雄人物个性特征,并通过对中国式官场文化的书写,表现了英雄人物忠君式爱国的悲剧、宦海生存的艰难以及理想突围的困境。小说流露出创作者矛盾的主体意识,体现了对中国式自我身份认同的思考。

[关键词]《张之洞》;精英文化人格;官场文化;英雄悲剧;自我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1-0014-07

A Tragic Hero in Chinese Officialdom

——Review on Tang Haoming's Long Historical Novel *Zhang Zhidong*

YAN Xiaofang; WU Touwe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ang Haoming's long historical novel *Zhang Zhidong* moulds a Chinese hero with traditional elite culture character. The novel highlights the subject value of the hero in adversities and conflicts, and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ro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character comparison. Through the writing of Chinese officialdom culture, it also presents the tragedy of loyal patriotism, hardships of officialdom survival, and the dilemma of realizing ideals. This novel reveals the writer's contradictory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embodies the thinking on the Chinese self-identity recognition.

Key words: *Zhang Zhidong*; elite culture character; officialdom culture; heroic tragedy; self-identity recognition

提起湘籍作家唐浩明,记忆中依然难忘上世纪末出现的“曾国藩”风靡效应。一时间,国人从上到下,从学者到商人,从官员到百姓,从教师到学生,开口闭口“曾国藩”,似乎只要言说“曾国藩”,就显得相当的有文化。的确,在“国学风”渐酣以及一部分人心照不宣的“复兴中华民族伟大文化”使命感

的激情驱使下,唐浩明及其浸润浓厚“中国式”历史文化精神的系列长篇小说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化界的重要符号。他秉持传统历史观念,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之上,通过艺术想象,再现了晚清这一中国特殊时期一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主体浮沉及坎坷心路历程。他塑造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人格为核心

收稿日期: 2014-06-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51039);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BA149)

作者简介: 颜小芳(1982-),女,湖南永州人,广西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批评; 吴投文(1968-),男,湖南郴州人,湖南科技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中国式英雄形象,再次引发人们对文化传统与革新的思考,对知识分子个体在家国使命、社会承担等历史宏大叙述与个体自我欲望选择之间关系的思考。本文将从历史人物与中国式英雄符号建构、历史情境与中国式官场文化书写、历史情怀与中国式自我身份认同三个方面评述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唐浩明历史小说。

一 历史人物与中国式英雄符号建构

关于“英雄”的定义,首先会让人想到《左传》里面的一句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谓三不朽。”只要能够做到这“三不朽”中的任何一方面,都能称之为英雄。如若三方面都能做到,那一定超出一般英雄之上,可谓圣人。据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做到了“三不朽”。两个人分别是孔子和王阳明,还有半个是曾国藩。中国传统文人以儒学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儒学讲“内圣而外王”,并提倡经世致用的读书理念。李泽厚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一书中概括了儒学的特征为实用理性。儒家知识分子并不提倡清谈,他们希望读圣贤书之后能够从事经天纬地的大事。尤其科举制形成后,读书人都以能够考取功名、入阁拜相为人生功业最高追求。

唐浩明历史小说的主角,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从曾国藩到杨度到张之洞,他们无一不把建功立业当作世俗的最高理想而奋勇追求,并且曾国藩和张之洞都取得了令世人望尘莫及的巨大成功,做到了人臣之极致。由于身居官场显要位置,他们在晚清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最能真实凸显时代风云变化。这样的历史本身就是一出华美的表演。而作者唐浩明也极度想从这些灿若星辰的历史英雄人物身上寻找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身份认同,从而给当下现实中的人们在自我主体建构方面更多的启示。

(一)在逆境选择和矛盾冲突中突显英雄人物主体价值

唐浩明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是历史真实对象与创作者主体精神拥抱、碰撞的结果。作者有意识地选择在人物生命中重要转折时刻(通常是逆境)及重大矛盾冲突中去表现人物的主体意识,从而突显出人物非同一般的英雄气概。中国式英雄的代言人孟子就曾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在唐浩明的小说中,曾国藩出场时已人到中年,国家政权摇摇欲坠,仕途前景难料,又遇慈母去世,回湖南老家奔丧,途中竟遭太平军劫持,成为阶下囚。如何在逆境中反败为胜,溯流而上,是对英雄人物的重要考验。张之洞出场时43岁,却还是一个五品小官员,并且几乎没人会觉得他此时的官职“洗马”也是一个官。又加上他身体有病,身材矮小,长相丑陋,并且因为他为官清廉,几乎没财产,所以此时的张之洞在世人眼中几乎没有可以令人艳羡之处。就连慈禧第一次见到张之洞,也因为嫌他长得丑而不能正确对待其才华和忠心,没有委之以重任。

无论是曾国藩出场时的“沦为阶下囚”,还是张之洞出场时的“怀才不遇”,选择逆境作为人物出场的背景,明显是作者有意为之。这里有唐浩明某种程度的自况。首先,唐浩明属于大器晚成型作家,从默默无闻,到誉满文坛,期间的心路历程想必不是一般人所能经历和体会。其次,“人到中年”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主体意识和客观存在的差距,既是历史人物有的,也是作家自身存在的写照。作者选择“逆境”作为开场,既是为了更好地突显英雄人物在逆境中的绝地反击,也为了在历史人物身上寻求答案、动力,寻找支撑、信念。

从《史记》开始,司马迁塑造历史英雄人物形象时就特别注重在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真实品格,这种写作方法也影响到后来中国传统小说。像《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中的英雄,就是在矛盾斗争中才能展现出或智或勇或智勇双全的英雄品格。美国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也说过:“个人在压力之下选择的行动,会表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压力愈大,选择愈能深刻而真实地揭示其性格特征。”^{[1]441}张之洞的英雄品格,正是在一系列矛盾冲突中得到体现。外交方面,张之洞坚决主战,面对崇厚割地赔款的“卖国”行为,拍案而起,义正言辞,爱国激情溢于言表;东乡冤案事件,他明知案件牵连面广,“翻案”阻力大,但依然直言上疏,为民请命,体现士大夫敢于为老百姓担当的责任意识和承担精神;尤其在获得醇亲王和慈禧赏识,可以在出任侍郎和巡抚之间选择的时候,张之洞并没有选择官位尊贵、官职轻闲,又是在京城之中且生活安逸舒适的“侍郎”一职,而是选择去往较为偏远且贫穷的山西去做巡抚。可见张之洞想

要真心实意做一番实事的决心。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尽心竭力办实事。他担任山西巡抚时,与当地腐败官员斗法,禁鸦片,清库款(反腐败);后来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又礼贤下士,请出老将冯子材,联合多方面力量,在越南打败法国军队,成为少有的能打胜仗的读书人。张之洞努力践行儒学“内圣而外王”的追求,这一点他和曾国藩很相似;并且张之洞身上还体现出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这些都是传统士大夫的美好品质,它们构成了中国式英雄符号的所指。

(二)在社会关系和人物对比中突显英雄人物个性特征

小说《张之洞》除了塑造英雄主人公张之洞外,还写了形形色色的人。不难发现,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与张之洞有些关系,并且他们的行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都影响着中国政治时局的变化。正是在这样一张纵横阡陌的人际关系大网中,张之洞自身性格得到彰显,并且张之洞的人生命运也与这张人际关系大网密切相关。

在张之洞的社会关系网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慈禧——一个拥有花容月貌和至高无上权力的女人。无数官员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的前途都取决于她的一颦一笑。这个慈禧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封建中国的很多奇葩现象。一个排斥女性压制女性的封建父权制国家,竟然会任凭一个女人摆布40多年。并且权力之于中国封建官员,就像上帝之于基督教徒。只有在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中,让人看到了基督徒崇拜上帝的热情。而慈禧这样一个女子就扮演了“权力上帝”的角色。

慈禧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影视改编的热点。历史上对她的评价以负面居多,而影视作品也大多为了满足观众对宫廷秘闻的窥视欲而选择奇观化、视觉化的呈现。唐浩明却并没有对慈禧做妖魔化或者类型化的处理。《曾国藩》中虽然也提到了慈禧,但都是三言两语就带过;只有在《张之洞》中,慈禧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登场。

作者肯定了慈禧在维护清朝统治政权方面所做的努力。首先,慈禧爱才,惜才,善用人才,为清朝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忠君爱国的好臣子。例如张之洞屡次仗义直言,且在办实事的过程中得罪不少权贵,都因为有慈禧的理解和支持,他才能真正做成自己想做而又对国家有利的事。再比如

对待阎敬铭,慈禧也相当器重,礼遇有加。慈禧分得清哪些人真有才干,哪些人不过是溜须拍马锦上添花。慈禧对人才的重视和善用对维护大清国的统治有积极作用。其次,慈禧基本能够采纳大臣们提出来的合理建议,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因此赢得了一帮传统士大夫官员的拥护。例如慈禧对待“清流党”的态度,尽管她也觉得“清流党”说话尖刻,不留情面,但她也深知“清流党”存在的意义,所以对“清流党”采取了极大宽容乃至支持鼓励政策,这也使得当时清朝政治呈现某种程度的开明。第三,慈禧深谙“政治平衡”的道理,所以她有意采取“制衡术”,以此来巩固大局,维护稳定。以上都说明慈禧是一个聪明、理性、识大局的统治者。

但慈禧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慈禧比较感性。例如她欣赏张之洞的才华和忠诚,想要破格提拔,只是因为其长相丑陋而打消上马提拔的念头。其次,慈禧专制任性。例如有一次,慈禧的妹妹——醇亲王的福晋过生日,慈禧派太监出城给妹妹送贺礼。小太监仗着慈禧的权威,出门时拒不接受门卫检查,还与门卫发生冲突。慈禧知道此事后,公私不分,重责门卫,拒不接受大臣批评意见。慈禧最大的缺点是自私。在清朝危急存亡关头,她竟然挪用海军衙门的钱给自己建养老用的颐和园,造成巨大财力人力浪费。

张之洞后半生令人艳羡的官运正是拜慈禧所赐,慈禧是张之洞生命中最大的贵人。早在张之洞考进士时,他就被慈禧慧眼识英,钦点为探花。对此,张之洞对慈禧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激和尊敬。正因如此,张之洞每次写奏折提意见时,都会充分考虑到慈禧的感受,努力做到既不伤害慈禧的尊严,又能把问题说明白。尤其在慈禧派小太监给妹妹送礼事件的处理上。当时也有其他大臣上奏折批评慈禧对事件的处理欠妥当,但没有一个人的奏折能真正打动慈禧,从而减轻对门卫士兵的重罚。只有张之洞感动了她,因为她在奏折中不仅读到了张之洞对整个事件的真实看法,而且还感受到了他的良苦用心,里面包含体贴、尊重和关切。可见张之洞非常善于与慈禧沟通,而不像其他知识分子例如“清流党”那样锋芒毕露,他善于讲究策略。这种相对圆融的处事之风也是张之洞能够比其他人更容易在现实中办成事的原因之一。

小说还写了张之洞与桑治平亦师亦友的关系。张之洞与翁同龢也形成鲜明对比。张之洞的圆通、

达观、开明与翁同龢的保守、固执、偏见形成读书人的两种性格。另外张之洞与辜鸿铭也是一庄一谐,一个循规蹈矩,一个离经叛道。张之洞爱惜辜鸿铭的才华,欣赏辜鸿铭的求学精神;辜鸿铭则佩服张之洞中国学问做得好,心甘情愿拜张之洞为师。此外张之洞与光绪皇帝、醇亲王奕譞、堂兄(军机大臣)张之万、阎敬铭、袁世凯、大学士李鸿章、太监李莲英、清流党人陈宝琛、张佩纶等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实业家盛宣怀、郑观应,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之杨锐、谭嗣同、杨深秀,湖广衙门诸幕僚,山西、湖北、广东诸省的巡抚、藩司、道员等等都有交往或联系。张之洞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彰显出成熟、理性且强大的主体意识,从而突显其重要位置。

二 历史情境与中国式官场文化书写

历史小说离不开对历史情境的再现,这对理解历史人物心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有重要作用。作者从以下历史情境入手,还原了历史人物成长的历史环境,构造了中国式政治英雄诞生的中国式官场文化语境。

(一)专制体制与“忠君”式爱国悲剧

中国从夏朝开始就进入了专制政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就连神的作用都是维护天子统治地位,成为天子统治人民的工具。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可以看到专制的轮回——从清廉的专制到腐败的专制的历史。专制文化已深入中国人骨髓。专制体制的最大作用就是维护天下大统一,而专制体制对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最大影响则是将忠君与爱国相提并论。

所谓“士”,在作者眼中即是封建社会文化的阐释者、践行者与传承者。有学者喜欢将唐浩明与二月河比较,认为二月河善于写明君,而唐浩明善于写名臣。对此,唐浩明本人并不赞同。他认为自己写的不是名臣,而是“士人”：“‘名臣’与‘士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真正的‘士人’是有自己的信仰和理念的。这种信仰、理念,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道统’。”^[2]故而“士”大都具有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国家兴衰存亡的关头往往能迸发出极强的生命力量。

中国素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说法。每个士,都渴望遇见一个知己,而这个知己就是贤君。从屈原

开始,中国真正的“士”对“知己贤君”的渴求和忠贞可谓百折不挠九死未悔。无论是曾国藩还是张之洞,都是坚决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以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稳定、促进封建国家繁荣富强为己任。体制文化的局限注定了曾国藩、张之洞们不可能是封建文化的贰臣逆子。所以当晚清政治已极端腐朽并逐渐走向反动的时候,曾国藩、张之洞们则成了封建专制的帮凶或者帮忙。这也是后人从“阶级论”出发对他们进行批判的主要原因。

(二)实用理性与宦海生存之艰辛

唐浩明对晚清政治官场文化的深刻洞察无疑也为他的三部历史小说增添了独特魅力,并汇聚了不少人气。晚清王朝已经走到中国帝制专制末期,除了政治腐败,其国内国外局势也让晚清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既急需汉族优秀官员为朝廷出力以稳固统治地位,又要提防手握重权的汉族官吏。身为晚清重臣又具有深厚学养的曾国藩、张之洞们对清王朝的“中兴”“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不动声色地揭露了晚清官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角逐和权力斗争。例如张之洞的破格越级擢拔,表面上看是朝廷慧眼识英、重用人才的表现,实则它却是慈禧“制衡术”中的一颗棋子:慈禧越级提拔张之洞,是为了制衡功高自大的李鸿章、曾国荃等人;而醇亲王极力举荐张之洞,也不过是想要在朝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以对抗恭亲王等势力,同时他也想为日后逐渐摆脱慈禧的控制而积蓄力量。张之洞的擢迁与当年左宗棠的崛起道理如出一辙,都不过是为政者“政治平衡术”的结果。

曾国藩与张之洞是中国千千万万个读书人中极为少数的幸运者,更多的人则沦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例如同为清流党出身的其他官员,他们的结局则悲惨得多。清流党中流砥柱之一张佩纶,敏捷善思,才华横溢。他敢于直言、善于进谏的鲜明个性,为自己在官场上流下了清流的美名,然而他也因此树敌太多。他可能做梦的都没有想到,自己被李鸿章不动声色地陷害,被派去福建督办海军事物。从未带过兵打过仗的张佩纶在现实中一败涂地,福建水师在马尾港之战中全军覆没,张佩纶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清流党另外一位重要成员陈宝琛同样也被李鸿章名为举荐实则陷害,被派往与其政见不合的曾国荃的军队做会办,结果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被曾国荃折磨得心力交瘁、声名狼藉,并且还因此被慈禧连贬五级,在中国官场销

声匿迹了20多年,直到垂垂老矣才重新出山,做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清流派的另外一名要员宝廷则为了一个麻脸船妓自刎,以毁坏自己名节的方式保全自己,从而退出了政治斗争漩涡。

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张之洞和曾国藩们无不殚精竭虑地为能够跻身权力顶峰而绞尽脑汁,他们将各自生平所学来回咀嚼反复参透并加以变迁,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式官场,他们深刻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并且也极其善于在传统士大夫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庸俗市侩残忍无情的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因此他们的成功一方面固然归于历史选择的机遇,但另一方面也是他们能够从传统士大夫理想、高蹈的精神世界走出来,融入现实并利用现实的结果。

张之洞的为官之道,小说有一些总结。例如,其堂兄张之万教导他:第一,要寻找一有能力的靠山;第二,为政不能得罪巨室。除此之外,还要善于和上级(顶头上司)搞好关系。张之洞为什么官运亨通,并且在危难之际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夷,归根结底是慈禧对他的信任。张之洞的本事就在于无论做什么事他都能争取到慈禧的理解和支持。面对慈禧的专制和任性,张之洞深谙以柔克刚的道理。很多时候张之洞都霸气侧漏、威武不屈,但在慈禧面前张之洞从来都恪守为臣之道,把姿态放得非常低,与清流党的高调犀利尖刻形成鲜明对比。他对慈禧极尽委婉耐心诚恳尊敬体贴之能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纵使钢铁之心都会被他软化,这样使得慈禧对张之洞的信任超过了一般的君臣关系。面对诸多大臣不同程度的用心和算计,只有张之洞会让慈禧在“制衡术”之外,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

除了跟顶头上司搞好关系之外,张之洞也深刻明白在中国式官场,没钱办不了事的道理。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张之洞意识到:“天下实事的兴办莫不是建筑在财力的基础上,而其最终目的莫不落脚在利益二字上。”^{[3]12-13}因此,深受传统文化对读书人理想人格塑造影响的张之洞,为了筹钱,竟然也能暂时置圣人圣语不顾,冒险开闸赌筹钱。为了能够办成实事,张之洞不得不学会和多方势力打交道。他之前看不起的官员和商人,他也渐渐学会和他们斡旋,因为他懂得其间的利害关系。小说展现了各方面的利益冲突,但处于权势和利益核心的张之洞,却没有为自己谋过任何私利。

唯实用至上的观念,一直是中国式官场的特

点。唐浩明也说过:“中国的官场文化有很强的实用性。”^[2]对于张之洞的实干精神,作者持的是赞赏态度。张之洞秉信“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4]68}的求学原则,力主要“安世济民”^{[4]69}。将张之洞与清流派其他要员进行对比,作者的褒贬倾向显而易见。然而,对于张之洞在兴洋务、办铁厂时的好大喜功、讲究面子的形式主义作风,作者也流露了批判,这是中国式官场的另一特征。中国人官本位思想严重。作为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张之洞,由于不懂科学,加上专制专横,导致所炼钢铁质量差;又加上传统思想里面的重官轻商,用官场的一套来办洋务,致使被人诟病。同时他急于求成,不惜用造假的方式来在俄国人面前长自己之威风。

(三)腐败社会与理想突围之困境

作者在小说里犀利地揭示出清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腐败。晚清政府实际统治者慈禧,不仅奢豪糜费,并且以权谋私,挪用海军衙门银子建颐和园;用卖官鬻爵等笼络手法来驾驭臣工。其他权贵们也鲜有励志图强者,而是结党营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李鸿章就不知聚敛了多少不义之财,他本人贪婪,他的兄弟子侄则更是放肆聚敛,以致合肥李氏家族成为安徽最大财主。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对李鸿章的讽刺挖苦既辛辣又形象。其他官员无论大小,都以盈利肥私为目的,他们既无政治信仰,又无人生产理想。

张之洞在武汉兴洋务、办铁厂时,吴秋衣的一番话真实道出办洋务真正的困境:“今日中国的积贫积弱,不是没有洋务,而是中国有这样一个腐败贪婪懒散推诿又盘根错节官官相护的官场,这是中国的万恶之源,贫弱之本。”^{[3]219}在这样的官场,张之洞仅靠一人之力,欲挽狂澜,他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故而吴秋衣对张之洞办洋务的预测也并不夸张:“今日中国就好比淮北的水土,外国好比淮南的水土,洋务这东西在外国是可口的橘,一到中国来就变成酸涩的枳了。腐败的官场,就是中国成为淮北水土的根本原因。而这,你一个张香涛是无力改变的。所以,你纵有天大的才干,也成不了事。”^{[3]219}因此张之洞的悲剧也是中国式官场传统士大夫理想的悲剧:“中国官场一切根深蒂固的恶习痼疾,不上半年功夫便深深地缠住了这个新生的汉阳铁厂。”^{[3]274}因此纵使张之洞再怎么励精图治,对于病入膏肓的晚清政权也是回天乏术。

小说塑造了一批像栗殿先、赵茂昌这样典型官

宦式人格形象,他们表面上投张之洞所好,私下无论做人做官,都与张之洞的理想南辕北辙,他们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将新兴的汉阳铁厂搞得乌烟瘴气:“栗殿先控制的后勤几个股处便被办成大大小小的衙门,各级官府惯常的衙门作风:敷衍、推诿、拖欠、散漫、不负责以及讲排场、铺张奢华等等在股处中滋生蔓延开来。属于技术部门的机器股、化铁股、制钢股、化验股也纷纷效尤。这些股的主办人员也一个个包揽私人,拉帮结派,一个原本只需要十几个人的铁厂办公部门,很快便高达三百多人,许多人占着一个位子,只拿薪水不干事,更多的则是一桩事每个股处都沾边,既都要行驶自己的职权,又都不承担自己的责任。”^{[3]274}作者这段话虽是对铁厂行政面貌的描述,实际上却道出了中国式官场的病痛,即便是现在 21 世纪的中国,这样的现象依然还不少。

张之洞是中国式官场中鲜有能够坚守传统士大夫节操的人。张之洞对贪婪腐败深恶痛绝。张之洞的幕僚兼好友桑治平曾经就与张之洞约法三章,其中第一就是不要做贪官,深得张之洞认同。与李鸿章比较,同样是清廷重臣,后者家财万贯,而前者却一贫如洗。张之洞和曾国藩一样,立志要做清官。他一直牢记父亲的告诫:“为官之道,首在清廉。”^{[3]199}张之洞临死前对自我的剖析,令人感动和敬仰:“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屋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5]591}可见,张之洞在中国式官场的腐败烂泥中突围的方式,是传统士大夫对理想人格操守的信仰。

但他的突围是失败的。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无孔不入,它对人的腐蚀与渗透以到了让人无法察觉的地步,连张之洞这样有着超强自我控制力的人都会被拖下水。“为谋取暴利,任何手段都使得出。他们能以最为巧妙之手段让你受贿而不自知,受贿而心安理得。”^{[5]200}长期跟随张之洞的赵茂昌,为了讨好张之洞无所不用其极。他将用罂粟浸泡过的人参当做补品献给精力不支的张之洞,并且送上一个经过精心调教的年轻女子。于是张之洞神不知鬼不觉地沾上了鸦片达十多年,并且在受过风月调教的年轻貌美女人勾引下放纵欲望。可见要在这样的社会大染缸坚守传统士大夫的操守该是多么艰难。作者真实写出了传统士大夫英雄在中

国式官场生存的不易。

三 历史情怀与中国式自我身份认同

小说创作不同于历史,它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它承载的是作者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独特世界观和人生观。作者选择曾国藩、杨度与张之洞作为历史小说的主人公,一方面肯定了他们积极入世的心态以及历史中建构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作者又对这些世俗的“成功”进行了怀疑和解构。作者矛盾的主体创作意识在《张之洞》中尤其突出。

此小说虚构了一个叫桑治平的人,某种意义上他是作者另一自我。作者以小说形式提出并思考人活在世上的价值选择:以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的儒家功利人生观,是不是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呢?桑治平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人生价值,即艺术人生。桑治平也是张之洞的另一自我。中国式官场充满了偶然性。桑治平的才华不亚于张之洞,只不过当年桑治平的靠山肃顺被慈禧搞掉了,桑治平才成为了隐士;如果肃顺能够崛起,那么建功立业的可能就不会是张之洞了。可见,政治或官场具有极强的偶然性、暂时性、机遇性,它总是此一时、彼一时,这对追求人生终极价值的传统士大夫而言,无疑显得有些虚妄。

也许桑治平并不成功的政治人生让他对政治事业的虚无和荒诞看得更加明白和透彻,所以他最后十分潇洒地选择了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秋菱归隐山林。桑治平与张之洞,一隐一显,前者代表了另外一种可能的人生,即追求爱情和艺术的人生。不管谁输谁赢,一切都是过往云烟,“只有爱情和艺术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永恒。功名也罢,地位也罢,其实都是以出售自身为代价。”^{[5]573}这是从政治生命向艺术人生的回归,从外在功利人格向内在本真自我的回归。张之洞晚年也在进行自我反思:“几十年来,仿佛做了事业的奴隶,而遗忘了人生的真趣。这难道就是辉煌的成功的人生吗?”^{[5]579}尤其临死前一句话,更是揭露了功利事业的虚无本质。“他说,他一生的心血都白费了。”^{[5]592}这样一来,张之洞的人生浸透了浓浓的悲剧意味,激情人生的背后,竟是虚妄;从而让原本铁肩担道义的人生更显悲壮,不得不说这就是中国式英雄的命运。在这里,作者流露出看待历史的个人视角,即思考个人欲望与家国责任的关系。中国式英雄,大多是以压

抑和牺牲个体欲望而达成现实的丰功伟绩,例如曾国藩就是一个压抑自我到十分悲苦程度的士大夫。

通观唐浩明全部历史小说,作者耗费大部分笔墨在主人公意识心理与理性层面(或曰精神层面)的表现,而较少笔墨去写主人公的个人欲望,例如“力比多”(libido)与爱情。即便是写了爱情,例如张之洞与佩玉、桑治平与秋菱,也大都是理性层面、道德层面。

通过对张之洞悲剧人生的刻画,作者实际上也提出了中国式自我身份认同的命题。作者主体意识的矛盾,并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释、道三种文化的影响。儒家入世的功利人格是知识分子主体构成的主要部分,但这种激流勇进的品格,在晚清时代风云变幻之中,难免不会受到伤害。所以为了减少悲剧,还必须辅以道家、佛家思想为补充。这样便形成一进一退、一显一隐的人格,进可以居庙堂之高远,退可守山林之寂寞。只有这样,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才会少一分压抑和沉重,多一份洒脱和飘逸。

作者在《张之洞》中大量借苏东坡的名句发表人生感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这一叹,将世上一切英雄都叹得心灰意冷了。”^{[5]576}张之洞在《摸鱼儿·邕城怀古》中也写过类似的感叹:“可恨是英雄不共山川住。”^{[5]575}张之洞与苏东坡一样,遍数世上英雄后,无非是感叹生命短暂,功业无法与山川宇宙长存,貌似有些出世思想的背后,恰恰是入世太深的表现。

唐浩明历史三部曲是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部“心灵史”,曾国藩、杨度和张之洞们被置放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传统文化和专制体制都濒临绝境,士大夫的心灵和精神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大变迁的考验。即便他们将传统士大夫的主体意识和生命力量发挥到极限,然而却依然无法挽救晚清帝制衰落的历史必然。传统文化

精神与时代要求之间的错位造就了曾国藩、张之洞、杨度以及传统士大夫精英们的历史悲剧,同时也是个体悲剧和文化悲剧。作者用精妙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了在文化和历史转折期,儒家文化精英们建功立业的悲苦人生与崇高精神。在传统士大夫的坚守、突围和迷茫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这一转型开启了中国朝向现代化迈进的前奏。唐浩明的小说直接、切近地展现出现代化的势在必行与举步维艰。以曾国藩、张之洞、杨度为代表的末代士大夫的探索为中国社会的富强与革新提供了种种可能经验,例如与当今现实有着极强相关度的洋务自强、整顿吏制、救亡御侮、反腐惩贪、兴办实业等内容,很自然地引申出改革开放、反腐倡廉以及民族复兴等主题,给人以深刻启迪。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总是给予我们今天某种需要。对爱国豪情的渲染,对社会责任的强调,对英雄品格的塑造,都是作者关怀现实、介入人生的一种独特方式,寄予了作者的理想和情怀。唐浩明历史小说包含着对知识分子民族文化人格重构的命题,同时也流露出对个体生命价值存在的思考,这一切都关怀我们永恒的生存。

参考文献:

- [1] 罗伯特·麦基. 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 周铁东,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 [2] 赵树勤,龙其林. 文学是时代变迁与精神发现的通道——唐浩明访谈[J]. 理论与创作,2010(1):58-61,120.
- [3] 唐浩明. 张之洞: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4] 唐浩明. 张之洞: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5] 唐浩明. 张之洞: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黄声波